■ 艺术研究

文献·科学·美学

——试论《考工记》研究的三种途径

高爱香, 韦 宾

(西安工程大学 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48; 陕西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19)

摘要: 清以前有关《考工记》的重要研究,基本上以文献注释疏证为主,经历了从注释疏证到章句贴括之学,最后以文献考据为总结。此后,尤其是近百年来,《考工记》的研究转向以数学、科学为主要的研究途径。近30年来,随着工业设计在我国的兴起,有关《考工记》设计美学思想的研究方兴未艾。《考工记》文献、科学和美学研究的这三种途径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关键词: 《考工记》; 注释疏证; 工业设计

中图分类号: B832.1; TB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283(2014)01-0134-07

收稿日期: 2013-09-14

基金项目: 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计划资助项目(2013JK0463); 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95017);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3FYS010)

作者简介: 高爱香,女,河南沁阳人,西安工程大学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副教授; 韦宾,男,陕西咸阳人,陕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考工记”是指“考试百工之事而记之”^{[1]卷上}。一般认为,《考工记》是战国时齐国政府制定用以指导考核手工业、工匠劳动制度的文献。西汉时期,因《周官》缺“冬官”篇,于是河间献王刘德将《考工记》补入后《周官》改名《周礼》,《考工记》遂成为《周礼》之一篇。《考工记》文字简古,应当是战国以来的古书。其所记载的内容不限于周代。有学者认为,三代的制度在《考工记》中都有体现。有关《考工记》的研究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清以前有关《考工记》的重要研究基本上以文献注释疏证为主,经历了从注释疏证到章句贴括之学,最后以文献考据为总结三个阶段,这种研究方式最大的弊病就是不重视考古材料的运用。此后,尤其是近百年来,《考工记》的研究转向以数学、科学为主要的研究方法,但这些研究方法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不重视以往文献研究的作用,使《考工记》的科学研究容易流

于“六经注我”式的研究,其方法是否真的科学则仍待商榷。近30年来,随着工业设计在我国的兴起,有关《考工记》的设计美学思想的研究方兴未艾,但作为一种与时代需求密切相关的研究方法,仍然有很多东西需要检验。

一、文献研究及其问题

中国传统治学最重视文献。在清代以前,文献研究几乎成为所有学术研究的惟一方法,这种方法又体现为注释疏证的传统。作为“三礼”研究的重要内容,自汉以来自然逃不出文献学研究的范围。在宋以前,《考工记》的研究基本附属于《周礼》的研究,其中汉代郑玄《周礼注》对《冬官·考工记》所作的注解,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按现有材料看,单独研究《考工记》应始于宋代。据文献记载有7种,从题名上看,其中6种有关《考工记》的研究皆以注

解为主。但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只有2种,其中一本即王安石《周官新义》所附《考工记解》2卷,是宋代郑宗颜辑王安石《字说》补成的。另一本是南宋林希逸的《庸斋考工记解》,比较有名,虽然《庸斋考工记解》主要以宋儒的观点为基本立场,常与汉代郑玄的有关研究不同,但仍然是注解的形式。林希逸对《考工记》的注解明白浅显,对初学的人有很大帮助。而且林希逸考察了一些相关的《三礼图》,将其中有关《考工记》的图编入书中,非常直观方便,今天其书仍然流传。这些研究的基本方式都是文献注解疏证为主。汉至宋的《考工记》研究可以视为《考工记》文献研究的第一阶段。

我国古代《考工记》研究以车制、礼制方面的研究为多,大多是以经证经,从文献到文献。而有关考古发现引起对礼制的新研究,至少在三国时期已经出现。此后随着古礼器的出土,人们不断地对古代礼制有关内容产生新的疑问和认识,尤其在北宋中后期,考古之风盛行。南宋蔡绦《铁围山丛谈》卷5谓:汉魏六朝隋唐,屡获古器,然在上者初不大以为事,独至赵宋,始见珍重,私人收藏与研究,以刘原父、欧阳修、蔡襄、苏轼、李公麟为佼佼者,至徽宗时“宪章古始,眇然追唐虞之思,因大崇尚。及大观初,乃仿公麟之考古,作《宣和殿博古图》,凡所藏者,为大小礼器,则已五百有几。世既知其所以贵爱,故有得一器,其直为金钱数十万,后动至百万不翅者。于是天下冢墓破伐殆尽矣。独政和间为最盛,尚方所贮至六千余数百器,遂见三代典礼文章,而读先儒所讲说,殆有可哂者”^{[2]卷5}。但这些对于《考工记》的研究似乎没有产生影响,这是非常遗憾的。仅仅局限于文献的注释疏证,也导致了宋以后有关《考工记》的研究走向章句之学。

在宋之后,对《考工记》研究较多的是明代。明代林兆珂撰《考工记述注》2卷,取汉唐注疏,参订训诂,疏通大意,主要针对少年儿童诵读。书末附图,全采用南宋林希逸《庸斋考工记解》中的图。郭正域撰《批点考工记》1卷,取《考工记》之文,圈点批评,惟论其章法、句法与字法。每节后所附注释也较简单,研究性较弱。徐昭庆撰《考工记通》2卷,也多斤斤于章法、句法与字法,而考据殊少。程明哲撰《考工记纂注》2卷,也主要在评点字句,于经义无所发明。名为纂注,实际上剽袭林希逸的文字,连林希逸的错误也被照抄。不但如此,一些在林希逸那里尚无错误的东西,如“軌”字,在程明哲的书中都改为“轨”,这就改错了。可以说,宋以后的《考工记》

研究中出现的这种将文献的注释疏证推向以章法、句法与字法为主,惟以攻时文帖括为能事的现象,正是文献研究不注重考古材料作用的弊端所在。晚清薛福成在其《振百工说》中指出“宋明以来,专尚时文贴括之学,舍此无进身之途,于是轻农工商而专重士。又惟以攻时文帖括者为已尽士之能事,而其他学业瞢然罔省,下至工匠,皆斥为粗贱之流,浸假风俗渐成,竟若非性粗品贱,不为工匠者。于是中古以前,智创巧述之事,阒然无闻矣。”^{[3]卷3《振百工说》}这篇文章虽然没有直接就《考工记》文献研究得失作出直接的评价,但他对宋明以来,专尚时文贴括之学的批评,实际上已经点出了宋明以来《考工记》文献研究的症结所在。宋明之间出现的以章法、句法、字法为主的研究方法,可视为《考工记》文献研究的第二阶段。

清代因为受乾嘉考据的影响,在《考工记》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江永著《周礼疑义举要》7卷,融会郑玄的注,参以新说,对经义多有阐发。其中解《考工记》2卷,尤其精核,对前人的研究多有更正。又戴震著《考工记图》2卷,补充了前人的不足,突破了明人处守章句、不知引申,胶执旧闻之习,得到同时代人的充分肯定。又王宗淯著《考工记考辨》8卷,也是以经证经,曲畅旁通,对前人之失多有所纠正。辛绍业《冬官旁求》2卷,则搜集了散见于诸书中有关冬官的内容。另如方苞《考工记析义》4卷、程瑶田《考工造物小记》8卷、吕调阳《考工记考》1卷及《图》1卷、阮元《考工记车制图解》2卷和陈宗起《考工记鸟兽虫鱼释》1卷,都是值得注意的。晚清孙诒让前后花费近30年时间作《周礼正义》,其中《考工记》的注释,几乎囊括了此前所有有关《考工记》的研究,可以视为此前《考工记》研究的总结。^①这些可视为《考工记》文献研究的第三阶段。应该说,考据学是中国传统章句之学中生发出来具有科学标准的学术,因为它一方面保留了传统学术的特色,一方面又具有科学精神。因此,清代考据学对《考工记》的研究,我们不妨将它看做是有关《考工记》文献研究的总结和科学研究的起步。

二、科学研究及其问题

在明清实学思潮影响下,《考工记》的实用性开

^① 有关清以前《考工记》研究的大致情况,可以参考张言梦《汉至清代〈考工记〉研究和注释史述论稿》,南京师范大学2005年博士论文。

始显现。康熙时期学者黄中《考工记题辞》谓“学者溺志于声柄俳偶词华章句,何如读此实用之书,而有裨于身心伦物也乎。”将《考工记》看做是一门有益身心的实用之学,而不仅仅是玩文弄墨之事。将《考工记》从礼制研究的范式中解放出来,将其实用性放在重要位置,必然引起《考工记》与科学关系的讨论。然而,西方科技在明清时期已经传入中国,但清儒有关《考工记》的研究涉及科学的并不多,所涉及也以数学为主,实际并未完全走向科学之路。其原因恐怕要从当时学者的卫道思想中去解释。

治《考工记》颇有成就的考据大家戴震,稍晚的余廷燦是这样介绍他的“少家贫,无以亲师友,亦不喜随人治世俗学。闻孔子定六经,示后人,求其一经读之,茫茫然无觉悟,寻思既久,乃自计曰: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辞也。所以成辞者其字也,由字以通其辞,由辞以通其道,必有渐”^[4]《戴东原事略》。可见戴震治学实事求是,完全出于本能探索,并不与当时西学思想有关,最多只能说受了一些实学思想的影响,因此这种研究问题的方法,是一种自觉的、本能的、本土的,是从章句之学演化而来,又与科学精神暗合的。这篇文章后面附有纪昀给余廷燦的信,信中说:

东原与昀交二十余年,主昀家前后几十年,凡所撰录,不以昀为介陋,颇相证质,无不犁然有当于心者,独《声韵考》一编,东原计昀必异论,竟不谋而付刻,刻成,昀乃见之,遂为平生之遗憾。盖东原研究古义,务求精核,于诸家无所偏主,其坚持成见者,则在不使西国之学胜中国,不使后人之学胜古人。^[4]《附纪大宗伯纪晓岚札》

纪昀在信中指出戴震《声韵考》有严重的硬伤。戴震不顾朋友的反对,坚持将这有明显问题的书稿付梓,则已与学术研究无关,而是来自一种“成见”,即“不使西国之学胜中国,不使后人之学胜古人”。可以看到,向来被誉为治学有科学精神的清代考据学家,在研究问题时之所以对于泰西科学技术不大重视,有其内在的原因,即是出于一种卫道的决心,甚至不惜牺牲“实事求是”的原则。这种情况不独在戴震身上有所表现,而可能是当时考据学家比较一致的认识。阮元《畴人利玛窦传论》谓:

自利玛窦入中国,西人接踵而至。其于天学皆有所得,采而用之,此礼失求野之义也。而徐光启至谓利氏为今日之羲和,是何其言之妄耶。天文算数之学,吾中土讲明切究者,代不乏人。自明季空谈性命,不务实学,而此业遂微。

台官步勘天道,疏阔弥甚,于是西人起而乘其衰,不得不矫然自异矣。然则但可云明之算家不如泰西,不得云古人皆不如泰西也。……学者苟能综二千年来相传之步算诸书,一一取而研究之,则知吾中土之法,精微深妙,有非西人所能及者。彼不读古书,谬云西法胜于中法,是盖但知西法而已,安知所谓古法哉。^[5]卷2下

可以看到,阮元的这种说法与戴震“不使西国之学胜中国,不使后人之学胜古人”的思想何其相似!在这种情况下,科学精神对《考工记》研究的渗透最主要表现在数学上,而数学只是自然科学的基础,还不能完全代表科学。戴、阮的时代,中国的文人对于中国文化尚有自信与自负。然而鸦片战争之后,随着清政府一败再败,那种盲目的文化自信又走向另一极端,对西洋文化尤其是科技的崇拜成为普遍的风气。到了晚清,薛福成写《振百工说》,认为宋明以前工居士农商之中,未尝有轩轻之意存乎其间;宋明以后专尚时文帖括之学,于是轻农工商而专重士。文士惟以攻时文帖括者为能事,而其他学业瞢然罔省,此适与泰西相反:

泰西风俗,以工商立国,大较特工为体,特商为用,则工实尚居商之先。士研其理,工致其功,则工又必兼士之事。……当其创一法,兴一厂,无不学参造化,思通鬼神,往往有读书数万卷,试练数十年,然后能为亘古开一绝艺者。往往有祖孙父子积数世之财力精力,然后能为斯民创一美利者。由是国家给予凭单,俾独享其利,则千万之巨富可立致焉。又或奖其勋劳,锡以封爵,即位至将相者,莫不与分庭抗礼,有欲然自视弗如之意,则宇宙之大名可兼得焉。夫泰西百工之开物成务,所以可富可强可大可久者,以朝野上下敬之慕之、扶之翼之,有以激励之之故也。若是者,人见谓与今之中国相反,吾谓与古之中国适相符也。中国果欲发愤自强,则振百工以前民用,其要端矣。欲劝百工,必先破去千年以来科举之学之畦畛,朝野上下,皆渐化其贱工贵士之心,是在默窥三代上圣人之用意,复稍参西法而酌用之,庶几风气自变,人才日出乎。^[3]卷3

薛氏这些话,其实质则是将“不使西国之学胜中国,不使后人之学胜古人”变成“不使后人之学胜古人”,而西人之学则毫无疑问是胜中国的。这些看法,应当代表了当时大部分知识分子的观点。对于“工”或科技的重视,催生了将现代科技及方法应用

于《考工记》的研究。近现代的《考工记》研究,有郭沫若《〈考工记〉的年代与国别》、戴吾三《考工记图画说》、闻人军《考工记导读》《〈考工记〉中的流体力学知识》、贺业锯《〈考工记〉营国制度研究》等等,还是比较多的。其主要特点就是比较注意结合西方科学的概念和方法来研究^①。将西方科学的概念和方法融入对《考工记》的研究,是20世纪《考工记》研究的一般特点。考古发现与《考工记》内容对照,并将现代数学及其他科学知识应用于其研究,使其出现了新的面貌,总的方面是值得肯定的,但也有一些问题。在这种研究中存在两种情况,一是借《考工记》来讲某些科技方面的问题,作六经注我式的研究;二是结合现代科技尤其是考古发现,对《考工记》做进一步深入的研究,是我注六经式的。

将数学知识应用于《考工记》研究是从清代学者开始的,这也是考据学的一大贡献。比如,过去古人没有角度的概念,有关角度的概念是通过对矩(90°)实施几何操作来描述的。《考工记·车人之事》谓“车人之事,半矩谓之宣,一宣有半谓之橛,一橛有半谓之柯,一柯有半谓之磬折。”因为不了解实际的工艺操作,仅仅从文献中解读它,所以东汉郑玄对此段解释是“矩,法也。所法者人也。人长八尺而大节三:头也,腹也,胫也。以三通率之,则矩二尺六寸三分寸之二。头发皓落曰宣,半矩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人头之长也”。^{[6]卷42}因为郑玄在学术上的影响,在清代以前,有关这段话的解读都沿袭了郑玄的错误。明末清初,西学传入中国,尤其是康熙皇帝对于数学的重视,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清代考据学,使数学的意识始能渗入《考工记》研究,所以到了清代程瑶田,始指出“百工皆持矩以起度,而倨句之度法遂生于矩焉”^{[7]卷7《宣橛柯磬折句度法述》}。明确肯定矩、宣、橛、柯、磬折是一套角度概念。当代学者用数学方法将这些角度具体推算出来“矩=90°;宣=1/2×90°=45°;橛=45°+1/2×45°=67°30′;柯=67°30′+1/2×67°30′=101°15′;磬折=101°15′+1/2×101°15′=151°52′30″”^[8],使这些概念更为清晰。这是数学方法运用在《考工记》研究中值得肯定的地方。但将数学方法过度使用,有时也是没有必要的。如《考工记》有关乐器发声特点的描述,有的学者用复杂的数学公式来表达,看似科学,其实不过是对已有说法更精确的说明,并不存在科学研究的方法与精神。

将考古发现与《考工记》的研究结合起来,在清儒(比如阮元)已经涉及,但尚未成气候。而在考古

发现基础上运用现代科学对《考工记》进行研究,是当代《考工记》研究的重要内容。刘广定针对近些年考古发掘器物形制与《考工记》不合的情况,提出《考工记》并无“手工业技术规范”的作用,并推想成书大约在秦始皇亲政之后。^[9]虽然这种研究结论受到质疑,^[10]但其研究方法是值得肯定的。类似的,如李锋通过考察有关两周都城的考古资料,发现本时期都城布局实际与《考工记·匠人·营国》的内容相去甚远,而西汉长安城“旁三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等布局特征与《考工记·匠人·营国》记载完全相同,则推出《考工记》应成书于西汉时期,也对其成书时间提出新见。^[11]又如后德俊通过对楚墓出土车伞构造、尺寸研究,认为与《考工记·轮人为盖》中的记载基本吻合,但认为《考工记·轮人为盖》中的一尺约为21—23厘米,而齐制的小尺约19—20厘米。这就对《考工记》是否为齐人所撰提出疑问^[12]。这些研究都是值得注意的,可称为我注六经式的研究。

不熟悉古文献是用科学方法研究《考工记》的最大问题。因为不熟悉古文献,一味生硬地用“科学”方法来解释,有时不免胶柱鼓瑟,其实也是一种迷信。这也是用科学方法研究《考工记》时遇到最多的问题。比如《考工记·磬氏为磬》谓“磬氏为磬,倨句一矩有半”(135°),又《车人之事》条中“一柯有半谓之磬折”(151°52′30″)程瑶田谓“磬氏为磬,倨句一矩有半,故曰一矩有半谓之磬折。持此以度他物,凡倨句之应乎一矩有半者,皆以磬折名之。故珥人为鞀鼓曰倨句磬折,车人内束之庇亦曰倨句磬折,而转写是记者乃顺上文读之,遂讹矩为柯。”^②“倨句磬折”矛盾在《考工记》研究界有相当的争议,各执一词,莫衷一是。其主要原因就是望文生义,将“磬折”理解为编磬所要求的角度,而不知道从古文用法上讲,它其实只是一个特定角度的概念。^[8]又如对“后素功”的解读。后德俊认为:

“后素功”是指什么?闻人军解释“后素功一先上彩色,然后再画白色背景图纹加以衬托。”并引用了《论语·八佾》中“绘事后素”的记载作为例证。……笔者认为“后素功”中的“后”,即是“厚”,是依赖的意思,“素”是素描,

① 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可以参考李秋芳《20世纪〈考工记〉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4年第5期。

② 见程瑶田《艺文录》,转引自阮元汇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79年影印本,第938页。

即画的底稿“功”即功底,指画稿的水平。就是说,绘画的好坏依赖于画稿水平的高低。“绘制后素”也可以这样理解。^[12]

其实闻人军的解释来自郑玄,也没有什么新发明,但“素描”是20世纪以来才有的概念,用来解释“素”显然很不合适。而且“后”解读为“厚”,在训诂上没有根据。可见将科技方法应用于《考工记》研究时,也要注意一些传统的学术功夫,不注意文献训诂,一味按考古发现主观套用解读《考工记》,也容易出现问题,这实际上成了六经注我式的研究了。

三、美学研究及其问题

阮元《商周铜器说(下)》在列数宋以前所获古鼎器物之为珍稀以后,说“北宋以后,高原古冢,搜获甚多,始不以古器为神奇祥瑞,而或以玩赏加之。学者考古释文,日益精核。故《考古图》列宋人收藏者,河南文潞公、庐江李伯时等三十余家。士大夫家有其器,人识其文,阅三四千年而道大显矣”^[13]卷3《商周铜器说(下)》。阮元所举的,如宋之李伯时,在当时是有名的绘画大家。这一时期,古器从神奇祥瑞转成玩赏的对象,同时有关它的文字研究也逐渐发达,可以说,有关中国古器的审美注意,从宋代开始是不过分的。不过这个问题若要具体到《考工记》情况可能要复杂一些,因为宋代考古发现还没有被充分应用于《考工记》研究。

从宋代开始,在《考工记》研究中就已出现了补图释义的方式,并且极大影响了后世。这种方式本来来自“图经”的传统,也并不与传统史学(学术)标准相悖。古人左图右史,“图”是学术的一个重要构成。只不过作图的事业非文士所能,且在印刷条件恶劣的条件下,复制非常困难。因此,左图右史在传统学术中,只剩下“文字”了。图的含义有两层,一层是审美的,一层是理性的。对《考工记》的研究没有图解不行,有了图解,则有关它的研究,必然也要涉及两层,一是理性的,一是审美的。当然,这只是《考工记》研究涉及美学的一种情况。清早期黄中《考工记题辞》谓“器以适用为贵,物以有济为佳。所贵于古器者,必有适用之妙。如不思所以适用之故,而必观美以为名高,刻舟求剑,何益于身心哉。”^①黄中的说法代表了很多人最直接、普遍的认识,即将实用与美观对立起来,认为这是无法调和的矛盾。但作为器物,它除了实用性之外,其美观也很重要,尤其是商品消费时代,这种情况更加突出。

在中国古代,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就是在实用

的外表加以装饰,比如,唐穆宗朝有一个善作木人机械的人叫韩志和。^②唐代苏鹗《杜阳杂编》记载说他“善雕木作鸾鹤鸦鹊之状,饮啄动静,与真无异。以关戾置于腹内,发之则凌云奋飞,可高三尺,至一二百步外,方始却下。兼刻木作猫儿,以捕鼠雀。飞龙使异其机巧,遂以事奏。上睹而悦之。志和更雕踏床高数尺,其上饰之以金银彩绘,谓之见龙床。置之则不见龙形,踏之则鳞鬣爪牙俱出。及始进上,以足履之,而龙夭矫,若得云雨。上怖畏,遂令撤去。”^[14]卷中这些描述虽不尽真实,但必有一定的生活依据。又《梦溪笔谈》卷7记载:庆历中有一木士姓李,“尝木刻一舞钟馗,高二三尺,右手持铁简,以香饵置钟馗左手中,鼠缘手取食,则左手扼鼠,右手运简毙之”。这些都是将具象形象与机械功能有机结合比较成功的。但仍然有一些机械物只是用具象的形象作外在装饰的,类似的例子也很多,这种结合可以看做是技术与传统艺术的结合,这种传统艺术,它以具象表达为主要特点,而机械运动往往依赖于几何体,这些几何体不具有审美特点的——至少在古典审美形态中是这样的。

19世纪末期,欧洲的情况与中国类似。1851年在伦敦水晶宫的世界博览会上,很多工业产品外形粗陋,仅用一些简单的图案装饰作为器物美观的修饰,这种方式与中国过去的做法是一致的。或者说,在那个时代,这是大家解决实用与美观的矛盾的主要思路。这一年的世界博览会直接刺激了“工艺美术运动”的形成。工艺美术运动的目的是反对机器美学,回复手工艺传统。工艺美术运动到20世纪初影响渐小,但它在20世纪20年代又催生了“工业设计”的产生。“工业设计”的产生真正受惠于现代派艺术,这主要是因为现代派艺术颠覆了古典的审美趣味,将抽象形式的审美价值呈现出来。毫无疑问,抽象艺术中的几何特征,是打通审美与工业产品机械生产的桥梁。李砚祖评价现代工艺设计运动时说“现代主义设计不是从根本上摒除了装饰,而只是改变了装饰的存在方式和形式,或者说,它摒除了传统的、表象的装饰旧形态,把装饰与结构同化,创造出了‘无装饰的装饰’的新结构新形式,并使装饰

① 清代黄中《黄雪瀑集》中《考工记题辞》,见《四库未收书辑刊》7辑23册第491页,此文后有“庚申蒲节后四日平字书”则应作于1680年。

② 按《太平广记》卷227《韩志和》:“穆宗朝有飞龙士韩志和本倭国人也。”

更深刻地进入了结构层面,丰富和拓展了装饰存在的意义,这也是现代主义的伟大贡献之一。”^[15]当然,除了这些之外,在美学理论上出现的技术美学,也开始将科学技术中的审美问题提升到哲学与美学层面进行探讨,并且出现了这样的认识,即最深刻的原理往往也是最美的。作为自然科学的理论基础数学,被认为与美有密切关系。一些科学家在推算某个公式时,也以美作为衡量的尺度之一。可以说,以往古典美学中的两个对立面在现代艺术运动和科技美学理论中得到了统一。那么,在这种背景下,既涉及科技又涉及审美(形式、形象、图像)的《考工记》,有关它的美学研究,是否能够展开?

美学家宗白华在其《美学散步》谈“虚实”问题时提到《考工记·梓人为笋虡》章,认为古代工匠在制作笋虡时,把整个器具作为一个统一的形象来进行艺术设计,启发了美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即虚和实的问题。他说“在这里艺术家创造的形象是‘实’,引起我们的想象是‘虚’,由形象产生的意象境界就是虚实的结合。一个艺术品,没有欣赏者的想象力的活跃,是死的,没有生命的。一张画可使你神游,神游就是‘虚’。……《考工记》所表现的这种虚实结合的思想,是中国艺术的一个特点。”^[16]³⁹宗白华仅仅从一般文献材料引用的角度涉及《考工记》。朱志荣等人认为,“《考工记》作为迄今所见中国第一部集大成式的工艺美术专著,反映了华夏先民在审美创造和鉴赏方面的不懈努力,也包含了技以载道,道器合一和技、艺统一观念。其中所蕴含的天人合一、五行相生、虚实结合、仿生造物的美学思想,迄今依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它们开创了具有典范性和普适性的造物审美原则,对于当下的工艺创造有着相当的借鉴价值和指导意义。”^[17]近些年有关《考工记》美学或设计学的研究渐热起来,这种热的真正原因,是近年来在中国日益蓬勃发展的工业设计运动。

1923年6月,民国政府制定的《小学工用艺术课程纲要》提出“研究并实习衣、食、住所最普通的原料的来源、用途和制法,工具的构造和使用;并引起尊重工作的观念,欣赏工业品的兴味,和涵养敏确整洁耐劳等德性”^[18]²⁹⁸。具体言之,在第三、四学年,在陶冶方面,要能引起学生对于普通工艺有兴味的情感;第五、六学年,在陶冶方面,学生要能引起对世界上一切工艺事业的同情,并发生深切的兴趣。这些提法是否受到这一时期国际潮流的影响,尚待考察。但目前来看,工业设计在中国的影响也是近

30年的事。1987年,中国才有了“中国工业设计协会”,当时,中国工科高校已开始出现了“工业设计”专业,但仍然不被重视,尤其是工科的学生,一般会认为“工业设计”是无用之物。不过,近些年来,中国工业设计的发展走上快车道,政府也提出要高度重视工业设计。高校的工业设计专业也多起来,而《考工记》则成为工业设计研究者必须了解的古籍,有关《考工记》艺术美学的研究,自然成为关注的新焦点。

近些年来,一些从事工艺美术史研究的学者开始关注《考工记》,如张道一、潘鲁生和刘道广等。由于工业设计在国内的普及,青年人关注《考工记》渐渐多起来,从近期检索到有关《考工记》的论文来看,有不少出自研究生之手。一般来讲,这些研究局限于泛泛而谈,尚缺乏严谨的学术规范和必要的文史知识的积累,而且往往引申过多。李艳指出,有关《考工记》美学研究,应注意“礼”对器物制造规定的意义,^[19]这个看法值得引起注意。但总体来讲,美学或设计学的研究如何纳入《考工记》研究,尚存在很多问题。而最重要的问题是,其学术研究的标准如何确立?当然,这个标准是要参照科学研究的,但科学研究所讲的证据、论证、明确而具体的结论,在目前有关《考工记》美学或设计学的研究中普遍缺失。

可以这样看,有关《考工记》设计美学思想的研究,首先应以对《考工记》本身作我注六经式的研究,这就要求研究者首先具备必要的文史知识,在此基础上,再来谈或者引申出有关“设计”思想的研究,而不是在还没有弄清楚《考工记》一些基本问题的情况下,作一些“六经注我”式的发挥。近来的《考工记》研究,尤其是有关美学思想方面的研究,虽然在研究方法上受西学影响,但将一些很晚才出现的美学概念套用在古老的《考工记》上,是不大妥当的,因为美学概念和科学概念是两回事,科学概念具有普遍的意义,而美学的概念则与时代、地域和文化关系很大,不具有普遍性,因此,不假思索地套用,使当前有关《考工记》的美学研究,似乎缺少了些笃实的作风,这也为我们研究《考工记》提供一个警示:虽然《考工记》有不少有关工艺设计的内容,但不能将这些东西泛化,陈义过深。

总之,文献研究依赖于文献的客观真实,即便如此,文献的局限性也是很大的,必须要有实物来验证,否则,在这种方式中进行的《考工记》研究,只能流于玄想;科学技术存在客观标准,因此关于它的研

究不分古今中外,只要有材料可验证都可纳入科学研究。因此,用现代科技概念和方法,对《考工记》中涉及科学的内容进行研究,无疑是必要的。但在这种背景下,作为古籍的《考工记》,其文献在这种背景下呈现为一种特别的材料,对这个材料的解读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如果这种解读出现偏差,那么,一些所谓的研究,可能只会成为六经注我式的研究;而关于《考工记》的美学的研究,是近年来才出现的一种现象。有关人类精神尤其是审美活动的研究,往往与一时一地的文化背景有密切关系,不存在绝对客观的标准,这种情况与“研究”所需要的客观标准是矛盾的,因此,有关《考工记》的美学研究,仍然有很多问题需要探讨。

[参 考 文 献]

- [1] 林希逸. 考工记解[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 蔡绦. 铁围山丛谈[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 薛福成. 庸庵海外文编[M]. 续修四库全书本.
 [4] 余廷燦. 存吾文稿[M]. 续修四库全书本.
 [5] 阮元. 肇经室续集[M]. 续修四库全书本.
 [6] 郑玄. 周礼注[M]. 贾公彦疏.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 程瑶田. 考工创物小记[M]. 续修四库全书本.
 [8] 关增建. 《考工记》角度概念当议[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00(2).
 [9] 刘广定. 再研《考工记》[J].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05(3).
 [10] 史晓雷. 《考工记》中车制问题的两点商榷[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08(4).
 [11] 李锋. 《考工记》成书西汉时期管窥[J]. 郑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9(2).
 [12] 后德俊. 楚文物与《考工记》的对照研究[J]. 中国科技史料, 1996(1).
 [13] 阮元. 肇经室三集. 续修四库全书本.
 [14] 苏鹗. 杜阳杂编[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5] 李砚祖. 现代艺术百年历程与装饰的意义[J]. 文艺研究, 1996(9).
 [16] 宗白华. 美学散步[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17] 朱志荣, 田军. 论《考工记》的美学思想[J]. 西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5).
 [18] 小学工用艺术课程纲要[M]//中国近现代艺术教育法规汇编(1840—1949).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97.
 [19] 李艳. 《考工记》美学研究定位[J].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6(5).

[责任编辑 何菊玲]

From Documents through Science to Aesthetics ——A Tentative Discussion on the three Approaches to Studies of *The Notes of Varieties of Trades*

GAO Ai-xiang, WEI Bin

(College of Clothing and Art Design, Xi'an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Xi'an 710048, Shaanxi;

College of Fine Arts,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Shaanxi)

Abstract: In the Pre-Qing times important approaches to studies of *The Notes of Varieties of Trades* had been done basically by providing notes and annotations. Later some more approaches had been introduced, such as the school of supplement and textual research, with the latter as the latest. After that, especially in the recent hundred years, the studies of *The Notes of Varieties of Trades* turned mainly to mathematic and scientific approaches. Finally, in the recent 30 years, with the rise of industrial design in China, there has been an ever-growing trend to investigate *The Notes of Varieties of Trades* in terms of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 of aesthetic design. However, the three approaches to the studies of *The Notes of Varieties of Trades* are of prominent features of their days and have each disadvantages of its own.

Key Words: *The Notes of Varieties of Trades*; notes and annotations; industrial design